



刘英（1905—1942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1942年5月18日，刘英在浙江永康方岩英勇就义，是第九位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浙江省委书记，时年37岁。

“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

1905年11月26日，刘英出生于江西瑞金的一个贫农家庭，原名刘声沐，字浴沂。他从小秉承农家子弟固有的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品性，9岁入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十四五岁就能吟诗作对，曾在家中墙壁上题诗“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表明要以书为友、勤学苦读，借以自勉。

1922年，刘英小学毕业，辍学在家务农，但不甘平庸，坚持自学。他为人处世深受乡亲们的赞许，先后被家乡松山小学、性定小学请去任教，教导学生爱国必先爱乡，学知识先学做人，要有正义感。其间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开始接受新思想，思考改造中国社会问题。刘英少时打下的文化基础铺就了他后来的成长之路。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1929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取得福建长汀长岭寨大捷，乘胜占领长汀县城。刘英得知这一消息后，与早已约好的同姓青年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并把自己和同伴的名字分别改为“刘英”“刘雄”。他说：咱们参加红军，就要做“英雄”，不能做狗熊！1929年9月，刘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与战友通信中写道：“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光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表达了他对党无比崇敬、赤胆忠诚，为党的事业甘愿献出生命的革命情怀。

入党后，刘英更加忘我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并被挑选到军部担任会计，后调任供给部出纳股长。毛泽东见刘英会写家书，文字基础不错，就问刘英是否愿意到军部做文书工作。就这样，刘英被调到军部任文书，在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进步很快。后主动要求并经毛泽东同意，他到前线战斗，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紧张，中央调红七军团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声东击西方式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并率先举起抗日大旗，推动抗日运动。

时任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的刘英随军奋战。12月，在潭家桥战役中，他身负重伤。由于部队药品奇缺，没有麻醉药品可用，刘英以坚强的意志，忍受剧痛，顺利完成了手术，战友们为之动容，称刘英是“红军中的关公”。由于创伤组织受损严重，刘英右手功能障碍，无法写字和用筷子。为了坚持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和用枪。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写：“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生一天活，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

1935年2月，根据苏区中央分局转至的中央指示，受伤未愈的刘英与粟裕率先遣队余部组成挺进师，刘英任师政治委员，粟裕任师长，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环境中，他们经常穿行于深山密林，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虽然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无数次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但他从未动摇过参加革命的决心，始终践行着他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刘英的

□ 吴地花 刘娟娟

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在刘英、粟裕等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历经竹口、濠郎等300余次战斗，创建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清剿”，建立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1937年9月，根据中央精神，刘英代表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代表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又投入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洪流。

1938年3月，党中央指示取消闽浙边临时省委，建立浙江临时省委，让刘英继续留浙江坚持斗争。5月以后，刘英历任浙江临时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闽浙赣三省特派员等职。在浙西南革命力量的配合下，刘英主持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全省抗日救亡的高潮。1939年3月，刘英率省委机关迁驻丽水，以便更好地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同月下旬，周恩来来到浙江视察，刘英向周恩来汇报了浙江的情况，周恩来称赞：“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仿效的。”

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不断涌现，因此，省委机关迁驻丽水期间，刘英以兴华百货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领导浙江党组织坚持隐蔽斗争，并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给妻子写下：“抛弃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革命与战争”。

“战死沙场堪自乐，图圈室内何我分！”

1941年4月，形势日趋恶化，刘英率省委机关从丽水迁回温州。1942年初，国民党将彻底“剿共”作为“刻不容缓之举”，到处搜捕共产党。2月8日，因叛徒告密，刘英被捕。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叫嚣：“刘英在浙闽两省边境活动多年，今一旦被捕，胜俘敌十万”。于是千方百计招降刘英，每次都遭到刘英的严厉斥责。见劝降无果，2月23日，国民党将刘英移押到永康县方岩。刘英虽身陷囹圄，依旧利用一切机会工作。他看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捕杀共产党人的种种罪行。经过刘英的启发和教育，看守任根荣非常钦佩刘英，曾帮助递纸条，还应刘英要求把纸和笔送进牢房。

国民党当局几乎每隔一天就对刘英进行一次审讯。面对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刘英始终是那句老话：“我的情况尽在档案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他被打得口吐鲜血还训斥国民党不思抗日、一心反共的罪恶行径。审问历时两个多月，刘英始终没有吐露党的任何秘密。见一切手段均无效，蒋介石仍令从速处决刘英。5月18日清晨，刘英被杀害于永康县方岩马头山麓。在狱中，刘英留下绝笔诗：“十年征尘到如今，偷生弹雨息枪林。战死沙场堪自乐，图圈室内何我分！”

毛泽东军事斗争中的妥协智慧

□ 胡雨晗

“斗争”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征。毛泽东一生崇尚斗争、善于斗争，凭借高超的斗争本领、顽强的斗争精神，带领党和人民军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毛泽东十分注重斗争策略，既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具体实际，正确组织发起攻势并作出有原则的让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妥协智慧运用得出神入化、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共产党保存了实力、积蓄了力量、得到了发展、赢得了主动，中国革命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

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深刻总结教训，提出必须组建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拉开了武装反抗的序幕，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斗争。由于当时对中国革命斗争特点规律认识不够，武装斗争主要集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大城市发起，所以均以失败告终。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峻形势，主张放弃攻打大城市，转战至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他打了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只是一颗小石子，是不可能打破国民党这口大水缸的，只有我们上山了，积蓄力量，把小石子变成大石头，将来我们才有实力打破那口大水缸。此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在井冈山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认真总结探索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深刻剖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系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为夺取全国胜利指明了方向。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为

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采取妥协的策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从而成功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以战略退却换取战役战术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结合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指出我们不能犯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而要实施诱敌深入的方针。战略上退却，战术上进攻，这是变战略被动为战役战术的主动；敌人进攻，红军退却，变外线为内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这是内线中的进攻战。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以妥协的智慧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取得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湘江战役红军损失十分惨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战略退却赢取战役战术主动，避开敌军主力，直逼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指挥千军万马四渡赤水河，上演了人类战争史上精彩绝伦的一幕，把蒋介石及其“追剿”红军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拖得溃不成军。中央红军则跳出了敌军重重包围，将其远远甩到身后，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河的胜利，是毛泽东巧妙娴熟运用斗争和妥协辩证关系的得意之笔。

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党努力调解下，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条件，国共开启了第二次谈判。在谈判中，毛泽东顾全大局，对国民党作出很大让步，以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尤其在红军编制中，由原计划编为4个军缩减为4个师六七万人。然而国民党仍不满意，提出无理要求。当谈判陷入僵局时，

毛泽东要求谈判代表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深刻指出，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于是，共产党再次让步将红军缩编为3个师共计4.5万人，并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联蒋抗日、共赴国难，共产党郑重声明：取消“工农革命政府”的称号，红军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此外，为了壮大抗日统一战线队伍，联合地主阶级起来抗日，中央主动将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改为减租降息政策。正是共产党的一再让步，才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对陕北发动进攻。在陕北战场，能够保护党中央和延安的军队仅有3万人左右。面对敌人优势兵力三面围攻和狂轰滥炸，毛泽东毅然决定主动撤离，放弃延安。众人不解，毛泽东向大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背着很重的包袱，包袱里装满了财宝，可是路上却不幸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面对这种情况，他该如何是好？如果背着沉重的包袱跟强盗打，一定打不赢，那财宝跟命就都没了。倘若他暂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话，就能全力以赴的跟强盗对抗，战胜强盗后，包袱自然也就保住了。他还说，我们放弃延安只是暂时的，并不损害战争胜利大局，今天放弃延安，将来要拿一个延安换全中国。3月18日，在轰隆的枪炮声中，毛泽东批阅完手头的文件，率中央撤离延安。第二天，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为了拖住敌军，党中央带领西北地区部队采用蘑菇战术，在陕北不断地与敌人周旋，充分调动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加以歼灭，从而使敌方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为我党发起战略反攻打下坚实基础，成为



监管体系、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持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着力构建“信用+风险”动态监管体系，对经济运行中的新业态新情况新问题精准监管，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偷逃税多发行业和领域依法严查。2018年8月以来，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打击“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专项行动，于2021年10月底圆满收官，共依法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44万户，挽回税收损失909亿元，并构建常态长效打击机制。2022年以来，重拳打击和曝光骗取留抵退税违法行为，为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落细落准落稳保驾护航。与此同时，从严从速查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重大偷逃税案件，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

主动融入国际税收治理，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环境

国际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 and 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领域。深度参与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主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推动全球税收治理变革中展现大国税务担当。

探索建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搭建多边国际税收合作平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党中央着眼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自觉把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自身重大职责，主动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为国际税收领域首个由中方发起设立的多边税务合作平台。先后组织开展线上视频会议20余次，建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建成多所“一带一路”税务学院，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征管能力。目前，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已增加至36个，观察员增加至30个。

切实加强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

在全球舞台上发出中国税务声音。从完善税收协定网络、降低税收负担，到承办税务外交活动、开展双边税务交流，再到主动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拓展税收合作广度深度，中国税务始终与我国国际地位提升相同步，大国影响力越来越大。截至目前，我国税收协定网络已覆盖112个对外投资主要目的地以及来华投资主要国家（地区）。先后承办税收征管论坛（FTA）大会、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亚洲税收管理 与 研究组织（SGATAR）年会等大型会议，建立第一个设立于非OECD国家的OECD多边税务培训中心，全方位开展税收领域的多边与双边交流。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征税规则制定，成功推动我国立场诉求在OECD“双支柱”方案和联合国方案中予以充分体现，有效维护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

积极优化国际税收领域服务，全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建立全面覆盖“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及主要投资目的地的国别（地区）税收信息研究机制，编制包含99个事项的《“走出去”税收指引》，先后发布覆盖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税收指南，为跨境投资创造确定、有利、合作共赢的税收环境。积极与相关部门开展数据共享与合作，持续为非居民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同步强化跨境税源管理，健全反避税防控体系，切实维护我国税收权益。

奋进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全国税务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奋力推进税收现代化，为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上接1版）2022年继续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预计全年退税减税2.5万亿元以上，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必将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税收制度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积极推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现行18个税种中已有12个完成立法，其他税种立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增值税改革年年深化、步步推进，基本建立起顺应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对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应。企业所得税更加注重鼓励创新，通过不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并实行提前享受等措施，有力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同时，从正式提出到最终落地历时25年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在我国成功建立，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以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多税共治”及以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基本构建形成，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税收征管变革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力添彩。税收征管效能是税务部门履行职能责任的基本保障，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务部门在推动税收征管体制三次大的变革中实现税收征管效能跨越式提升。2015年，聚焦“合作”，持续推进国地税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2018年，聚焦“合并”，初步构建起优化协同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2021年以来，聚焦“合成”，稳步推进发票电子化改革，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并开启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实际应用，着力打造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深入推进精细服务、精确执法、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努力实现以“合”促“成”的化学反应。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纳税人缴费人切实感受办税缴费的便利度和税收执法的公信力

连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动办税缴费优服务增效率。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连续9年部署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累计推出54类197项539条创新服务举措。其中，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大力推进“非接触式”办税缴费，目前96%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可网上办理，企业社保缴费全面实现“网上办”，个人社保缴费基本实现“掌上办”。2021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出100条服务硬措施并全部兑现。2022年结合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形成升级版，分三批推出121条服务举措，让纳税人缴费人享受更便捷更有获得感的 服务。

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推动市场主体减负降本成本。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这些年，我们推动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由87项减少至1项，95%以上的税费优惠事项由备案改备查，税费政策执行效率不断提升；持续精简办税资料，减少50%的资料报送和25%的纸质表证单书，全国范围内实现11大类146个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主动推出财产行为税“十税”合并申报，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附加税费整合申报改革，相关税费填报表单总量减少2/3。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国纳税指标排名不断上升；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第三方调查得分，从2017年的82分提升至2021年的87.2分。

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推动税收监管强震慑长发力。健全完善税务